

上编

理 论 编

第一章

语言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语言，或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传统的语言学中，好像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但是自从社会语言学问世以来，这个老问题却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社会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的看法，而是要给它增添一些新的内容。传统语言学给语言下定义时，是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事物来观察的，社会语言学却要把它放在它所存在的实际状况中来考察；由此产生了差别不小的定义。总的说来，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相互沟通信息和感情，并依靠它的帮助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的交际工具、认识世界的工具、使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重要手段。下面就想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个定义，因为正是从这个定义出发，社会语言学规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的；各种变异其研究方法也和传统语言

学有不小的差别。

第一节 语言和社会相互依存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也早已被人们所确认；但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这种社会现象，这又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抛开语言学历史上的各种学派的观点不谈，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主要是从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依存以及语言本身的存在方式而言的。

一、语言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 延续并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是由整体到细部，再由细部回到整体，不断循环往复而又呈螺旋型上升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小循环的完成，不但使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准确和深入，而且也对人类本身的进化，起了促进作用。换句话说，人类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提高，认识外界的手段进一步完备，改造外界的计划进一步详尽而可行，改造外界的措施更加有力，获得的成果也更大。而上述的一切进步，又为下一轮认识过程的循环和上升，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我们平常在想到或说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利用物质手段，改造物质环境所取得的成果上，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上；但我们却忽略了要想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取得和提高，都是离不开掌握并使用语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没有语言，不但不会有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社会。语言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科学界公认，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两大特征是：第一，人类具有创造工具，用以认识、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第二，人类拥有音节分明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通过词语的排列组合，造成几乎是无限多的句子，用以表达任何事物。其实这两个特征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设想，工具的创造是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所完成的。从利用现成的树枝、石块，到使用经过最初步打磨的石器，也一定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期；也许要有数代甚至是数十代人，在前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与同代人互相交流经验，或上一代人把经验传给下一代时，他们会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呢？实际的示范动作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仅仅这样就够了吗？连一些会发声的动物，也知道利用声音来传递某些信息；想来大脑更为发达的早期人类或类人的动物，也不会不利用这个天赋的手段。当然，那还不能称为“语言”，它可能只是一些笼统的、混沌含糊的、只有联系特定的语境才能了解其含义的声音。但这毕竟是用“语音”来表达某些意义，也许可以看成是真正的语言的萌芽。而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创造了人类。因为生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直立行走和使用前肢（最宽泛意义上的劳动），促使大脑的进化和“手”的形成；并使人类祖先的发音器官的发展，优于任何其他动物。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去判断，到底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语言，但说它们是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见《自然辩证法》中文版，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共同创造人类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大约是不错的。人类利用声音作为意义的物质载体，和动物利用叫声来传递某些信息，有本质的区别。动物传递的是某些生物的本能的信息（如果它们也可比喻性地被称作信息的话），因为这些特定声音和特定“信息”的结合，是先天固有的本能；动物个体几乎没有改变它的任何可能。如果说这种“结合”也有变化，那只能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或物种变异过程中，由生物本身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而且，动物叫声和某些信息的“结合”，只有物种间的差别而没有同一物种的不同群体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进行一次全球的旅行，我们会听到人类组成的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千种语言，却不会听到中国的猫和日本的猫在叫声上有什么不同，也不会发现美国的马和阿拉伯的马嘶鸣起来有多大差别。另一方面，同种类的动物利用声音来传递生物本能信息时，不但在空间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化也是很小的。通过使用表音文字的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断定：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狗吠和今天的狗吠不会有多少区别；但人类的语言在时间的长河中却完全不同。比如，虽然我们可以断定孔夫子说的也是汉语，而且也今天的汉语一样，用方块汉字作为它的书面记录符号；但是，现代的中国人，如果没有专门学习过古代汉语的话，对历史上流传下来写在纸上的孔夫子的话，是看不懂的。当代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等的研究证明：“语言”对于人类，在形成“概念”并进行推理、判断等最基本的思维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正常的人最基本的抽象思维活动是离不开语言的，更不用说高深的哲理思考和复杂的数学运算了。即使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功能齐全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也都是建立在人类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动物祖先之所以能进化成为“人”类，语言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语言是维系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

人类是一种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继续其正常生活的动物，不但以集体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群是这样，就是具有高度文明、掌握了航天技术的现代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越发展，社会分工也越复杂、细致，相互间的依赖性也越大。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正常关系，使分工合作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人们需要随时随地相互沟通、传递各种信息。虽然现代社会中，用来传递各种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但最基本、最方便的还是语言。而且，其他许多交际手段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人类离不开语言；在精神生活方面，人类更离不开语言。“人”是一种需要伙伴、害怕孤独的动物（无论是父母、子女、配偶、朋友，都可以看成是广义的伙伴），人类的这种特性，使人类社会形成了异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庞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网络的某个节点上，扮演着这种、那种角色，作为某些特定关系的承担者，享受着这个网络给予他的便利和权益，并对这个网络尽自己应尽的一份义务。没有这个网络，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而维系这个网络的主要手段之一又是语言。

（三）“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是通过学习并使用语言来完成的

人类靠什么来形成、维系、认识并利用“社会”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呢？我们平时总是习惯于从生物的、物质的基础，比如亲缘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着眼；其实我们又忽略了形成并维系这个网络的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手段——语言。蜜蜂、蚂蚁等动物，在繁殖、取食、抵御外来侵犯时，也有严格的分工；所以人们也常在比喻的意义上，谈到所谓蜜蜂、蚂蚁的“社会”。其实，这不能称之为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是生物本能的特性形成的。利用这个“社

会”，是任何一只蜜蜂或蚂蚁天生的一种本能：一只工蜂注定要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采花粉酿蜜，而一只兵蚁则只有从事抵御外敌的“工作”；它们都决不可能改行干别的事，所以形成并维系蜜蜂或蚂蚁“社会”的，是这些小生物生存、繁衍的本能。而人类的社会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类社会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认识、创造和利用这些关系。在人类个体如何认识他所从属的社会，如何学会扮演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来看，语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初生的、“生物的人”，虽然在生理机制上，由于千万年来的进化和遗传，已经具备了可能成为“社会的人”的条件，但要实现这种社会化，却必须通过学习。幼儿通过学习“妈妈”这个词，来确认他生命过程中第一个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随着岁月的增加，他将学会更多的词和句去确认、表达更多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对这种关系的态度。在他进入学校、结交友伴、逐步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中，他也通过对不同语言变体的掌握与使用，逐渐地完备着自己的“语言库”。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生物人”通过它转化成了“社会人”。当然，生物人的社会化，也还需要一些别的物质的条件，但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二、语言的生命只存在于人类社会 对它的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起源，即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一直是争论颇多的问题。但不管说它起源于手势、身姿或是呼叫，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大家公认：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类的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有声语言。而有声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完善的，没有人类社会，也不会有真正的

语言。

（一）语言因人类认识事物和相互交往的需要而产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蜜蜂、蚂蚁等动物的群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社会不是靠生物固有的本能来形成并维系的。处在“前人”阶段的灵长动物，比如类人猿的群体，比起蜜蜂、蚂蚁的“社会”来，可能高明不了多少。但一旦它们开始了向猿人进化的过程，它们之间也就开始有了某些不是基于生物本能的关系。为了确认、维持这种关系，基于生物本能的一些沟通手段，如吼叫、身体的某个动作、姿势、气味等就不能满足需要了。或者说，为了确认、维系这些新的具有“社会性”的关系，需要一种新的认识工具和交际工具。于是，作为人类特征之一的有声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只有有声语言，才具有不但可以表达这种非本能关系的能力，而且可以作为原始人形成抽象思维的载体，从而帮助原始人加速摆脱“听天由命”的低等动物状态，向成为能够改造外部世界的“万物之灵”大步迈进。

（二）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由于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得到原始人语言的样本，所以我们无法详述人类语言发展的具体过程。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学习语言的过程，或是把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相差悬殊的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而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这样做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语言本身从它作为所属社会的交际工具而言，无所谓优与劣”这个正确的论断，因为它恰好是建立在“语言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前提之下的。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观点，早已为中外语言学界所公认，但是语言发展的内容是什么，语言如何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又往往是一些语言学著作语焉不详的问题。社会语言学正是要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

1. 语言发展的主要内容

语言既然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交际的工具和标志社会身份的手段，它的发展当然主要表现在这三大功能的扩大和完善上。但三大功能的扩大和完善，又必须伴有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语体的多样化，词汇的丰富，以及语法的精密化。比如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人类认识外界和自身的局限，词汇可能是贫乏的，语法也不那么精确。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社会生活相对简单，那时的人际关系也不复杂，所以语言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有语体上的分化。语言标志人们社会身份的功能，也还处在萌芽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事物的范围和深度都增加了，人类活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生产开始出现分工；特别是出现阶级分化和创造文字之后，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空前迅速的文明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就会出现不同的交际需要，不同的交际场合，不同的交际对象和不同的交际目的；语体的分化就是必须的了。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着自己的语言：创造新的词语，扩大原有某些词语的意义去指称新的、过去没有的事物，从而丰富了词汇；改进粗疏的语法，使它日趋精密，以提高语句表达的准确性。社会的发展越快，语言中词汇的新旧交替、词义的改变和语法改进的速度也就越快，语体的分化也就越发多样化。以今天的汉语语体分化为例，不但有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分别，就是在书面语体中，还可以区分出书信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戏剧语体、诗歌语体、小说语体等等。如果再分得细一点，还可以把书信语体分为日常生活书信语体和工作事务交涉书信语体、涉外事务书信语体等很多具体的小类；每一个具体的小类在写作格式、所用词语和句子类型上都有特定的要求。在口头语体中，也还可以再分出正式语体、随便语

体、亲密语体、戏谑语体等等。而上述各方面的发展，必然引起语言结构内部的调整。无论是语音结构还是语义结构，或是语法结构，都会在尽量经济、方便而少些变动（这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发挥其交际功能所决定的）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的调节。古代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的过程，我们已不能（或至少现在还不能）作出具体的描述，但对比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同之处。目前我国西南方言和当地的兄弟民族语言互相影响而导致语言的某些变化，却是正在进行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用它作为社会因素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个例子。比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内，傣族和汉族聚居的地方产生了两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傣汉语（傣族所说的汉语）和汉傣语（汉族所说的傣语）。这两种语言都是受到母语干扰的第二语言，即傣族人所说的傣汉语受到傣语的干扰，而汉族人所说的汉傣语则受到汉语的干扰。在这种复杂的语言状态下，傣语和汉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它们的影响。根据陈保亚的调查，该自治州潞西三组 10 岁以下的汉族儿童，在区分汉语的三组音类上，出现了差别：

父母族别和语言环境	例 字				
	渴:河	你:里	难:兰	怒:路	树:素
	k:h	n:l(齐)	n:l(开)	n:l(合)	sh:s
父母纯汉族，汉族聚居区	1	0.95	0.53	0.50	0.65
父母纯汉族，傣族聚居区	1	0.10	0.00	0.00	0.00
父母半汉半傣，傣族聚居区	1	0.04	0.00	0.00	0.00

（表中数字为分辨率）

第一组的儿童在汉语的环境中生活，很少接触傣汉语，

更没有接触过汉傣语，所以他们完全能区分舌根塞音和小舌擦音、鼻音和边音、卷舌音和平舌音。第二组儿童居住在傣族聚居区，有机会接触傣汉语；受它的影响，在区分鼻音和边音、卷舌音和平舌音方面，比例大幅度地下降。第三组儿童父母中有一方是傣族人，因此这些儿童既可能接触汉傣语，也可能接触傣汉语；受它们的共同影响，对上面三组音的分辨率更低。据调查者讲，潞西、瑞丽、盈江等地，傣族中说傣汉语的人口很多，他们经常用这种傣汉语和汉族交谈，这使当地的汉语也出现了平卷舌不分、鼻音边音不分的现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因素（不同的民族相互影响）不仅促成了新的傣汉语和汉傣语的出现，不但使傣语内部结构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当地汉语方言语音结构的调整。

2. 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动因

有人把语言发展的原因，仅仅局限在语言结构的内部调整上，而不问它为什么要出现这种调整，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进行调整；从而把语言发展的社会动因排除于语言发展之外，这是不全面的。梅耶（A. Meillet）早就认为，语言的变异不过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只是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是直接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因为惟一能改变语言存在条件的是社会的变化。当代社会语言学认为，不但语言发展的最初动因应该从社会的变动中去寻找，而且在它的变化过程中，也还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变化的速度、方向和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谈到。总之，社会因素提供了语言发展的动因，而语言结构在这些动因的推动下，按照自己的结构特征来改变自

己。无论是语音上的合并、分化或链式转移，还是语法上范畴的增减、手段的更替，总的目标，都是服从于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对语言三大功能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语言中某个元音开口度的加大，直接起因于社会中某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或某个语法形态的脱落，标志社会中某个政治势力的衰落才算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虽然我们并不排除语言结构有可能出现这类形式的发展，比如美国纽约市r音的出现和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语言作为人们进行思维、交际的工具，标志社会身份的手段，除了它的符号内容——语义（部分表示语言成分之间关系的语义除外）与社会有较直接的联系，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社会的变化之外，符号的物质形式——语音及其结构，以及符号的组合聚合规则——语法，当然应该有它们自身的特点，即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有它们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规律。正如我们都承认，绘画、音乐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是，即便是与社会生活如此密切相关的艺术，由于它们在形式上，是以颜色组成的线条和音符构成的旋律、节奏来表现一定的内容的；我们也不可能把某些线条或音符直接对应于某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主要指的是社会因素是语言发展的动因，语言在发展的速度、变化涉及的范围等方面要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3. 语言随社会对它的需要的减少、消失而萎缩、消亡

如果某个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天灾、战争所引起的大量人口的死亡，或是另一个操不同语言的社会对它的征服与同化）消失了，那么它的语言也就会因为失去了存在的前提——社会的需要而死亡，这种情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当然，语言的死亡和生物个体的死亡不同，多数

情况下，它不是在短时间内结束生命，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退出交际的过程而被人们遗忘。比如从适用于一切场合（有适应于不同场合的多种语体），逐渐变为只能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也可以说是语体的减少）；从该语言社会的一切成员都使用它，到只有一部分成员使用它（使用范围的缩小）等等；如果这种趋势不断地继续下去，该语言也就逐渐地萎缩以至消亡。这种现象，不但可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得到证明，也可在当今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实地观察到。人类从比较落后的小农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转变过程中，原来作为不同地区本区成员交际工具的各个方言，都会逐渐让位于全民族的共同语；有的方言完全消失，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从一些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退出，只在家庭成员或亲密的朋友间使用。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的需要就是语言的生命线，语言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需要的扩大、复杂化而改善自身、完备功能；也随着社会需要的减少、消失而逐渐死亡。

4. 保留下来的“死的语言”

以声音为物质载体的口头语言，一旦退出交际舞台，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了满足异时、异地交际的需要，在口语的基础上，创造了它的书面记录符号——文字。文字和语言比起来虽然是第二性的，并受到语言的很多制约，但由于它是刻、写在甲骨、树皮、竹简、丝帛、纸张等物质上的，因此有可能在它的口语死亡之后，作为前人的遗物保留下来。有的时候，这些古代的语言也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使用，比如古典拉丁语被欧洲各新兴的民族语言所替代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被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和宗教语言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中使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死的语言”，比起真正消亡不再被人所知晓的口语

来，数量上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死的语言”的存在，更加证明了社会的需要是语言得以存在的前提。

第二节 语言以变异网络的形式而存在

一、语言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好像是多余的，因为一般人认为：答案太简单了。人们会说：语言不就是你、我日常说的话吗？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你、我说的话就是汉语这个语言吗？能不能把你、我说的“语言”的整体描述一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简单了。用专业的说法就是：语言到底以什么形式而存在。让我们先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公认的说法谈起。

（一）由音、义结合而成的语言符号总是以多种变异形式而存在的

普通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与“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按一定关系构成的系统；他认为某个特定社会的语言就像一本词典的原稿，而以它为模子印制出来的许多本词典，就是该语言社会每个人所掌握的言语。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特定语言系统中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否真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对同一语言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共同的呢？第二、特定语言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是否都同样掌握该语言系统中的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呢？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首先，符号的“能指”（在

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能指”到底是物质的声音，还是一种声音的心理形象；而只从常人的理解出发，把它看成是简单的“声音”）是否在所有成员之间都是共同的呢？也就是说，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群，用来传递同一个信息的声音，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否完全相同呢？现实中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在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两声“你好！”时，往往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一个声音属于熟人xx，而另一个发自某个陌生人；或是，一个是标准的北京音，另一个则带有某方言的色彩。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两个好似相同的“你好！”的声音（即“所指”），实际上是有差别的。我们一定还会注意到，即使同一个人使用同一个符号时，也可能由于说话场合、交谈对象的不同，而使符号的“能指”产生差别。比如，一个人遇见了他所喜欢的好朋友，和遇见了一个他正不想碰到的人时，同样说了“你好”这两个词；前一个“你好”听起来充满了愉快，后一个则带有十分勉强的味道；这两个“你好”给人的不同感觉，显然也是有区别的“能指”所引起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所指”（即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情况。比如，汉语普通话中的某一个符号的“所指”（即它的内容），是否可以看成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东西呢？答案又是否定的。尽管我们承认，同一语言社会的成员，对同一个符号的内容可能有大体相同的理解（有时连这点也未必能做到），但我们同时也得承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或同一个人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同一个符号时，不仅“能指”可能不同，“所指”也可能不同。比如，一个教师在去教室的途中，被人问到“你上哪去？”他回答说：“我（shàng kè）去。”这里的（shàng kè）被听话人理解为“给学生讲授课程”。但如果被问的人是个学生时，他所回答的（shàng kè）则自然会被理解为“听教师讲课”。又如，当一

个人说“他长得真（g o）”这句汉语普通话的句子时，通常情况下，（g o）这个声音所结合的内容，应该是“身体从头到脚的长度比常人要大”；可是，如果说说话人是在手指一个侏儒的情况下说出这个句子，那么（g o）的真实含义则刚好与上面的意思相反。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语言只存在于社会对它的使用中，那么，上面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在使用过程中的语言符号，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语境，总是以各种变异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个由符号的各种变异形式构成的系统。

（二）语言以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全体成员之中

紧接着上面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同一语言社会的成员，是否都同样地掌握了该语言系统中每个符号的各种变异形式呢？答案当然又是否定的。言语交际中的误解与障碍是屡见不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能理解为，不同的成员所掌握的语言变异形式系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市城区的青年，到北京郊区的某个山村去办事，当他因迷了路而向村里的一位中年妇女问路时，如果他说：“师傅，请问到××怎么走？”（这是北京青年人中非常普遍的说法。）被问的那位妇女可能很不高兴，认为这个青年“不会说话”，连个“大妈”或“大婶”都不会叫。这种情况反映了北京的城区和农村，在称呼同一类人时，称谓词有时是有差别的。又比如，北京市的一个煤矿工人，如果使用许多像“溜子”^①、“冒顶”^②等采煤工人常用的词语，和另一位北京的纺织工人谈

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人的行业词，指矿井中用来运输煤块的铁皮槽，一般安置在斜井中，利用煤块的重量和溜子的坡度使煤块自然滑动。
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人行业词，指矿井坑道的崩塌。